

美國人早期的漢語學習

顧 鈞*

在1830年代傳教士來到中國之前，美國商人中祇有亨德一個人認真地學習過漢語。1840年以後，美國傳教士編寫的漢語工具書陸續出現。這些工具書對於使用者的價值大小各異，但對於編寫者而言，編寫過程無疑是一個最好的學習和深入理解與把握漢語的機會。在編寫漢語工具書方面，衛三畏是貢獻最為突出的一位。

1784年8月28日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Empress)停靠在黃埔港，中美之間開始了直接的交往。在此後的五十多年間，儘管有不少美國商人和外交官來中國進行貿易和考察，但願意認真學習漢語的祇有亨德(William C. Hunter)一個人。1824年亨德被一家美國公司(Thomas A. Smith and Sons Co.)派遣來華，目的是學習漢語以便服務於該公司在廣州的辦事處。亨德於1825年2月11日抵達，由於發現很難找到合適的漢語老師，很快便離開廣州前往新加坡，希望能進那裡的一所學校學習漢語，但那所學校的情況也不理想，於是他再次轉往馬六甲，進入當地的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學習，直到1826年12月底。亨德於1827年初回到廣州，並很快見到了第一位來華的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824年離開美國時亨德曾帶着一封公司寫給馬禮遜的介紹信，但由於馬禮遜1824-1826年回英國休假(1826年9月返回廣州)，亨德直到1827年1月才得以見到這位最早來華的英國傳教士。如果當初馬禮遜沒有離開，亨德也許就不需要捨近求遠地遠赴馬六甲了。在中國已經生活了近二十年(1807年來華)的馬禮遜無疑是最好的漢語老師。兩人見面後馬禮遜測試了亨德在英華書院一年半的學習成果，結論是“優良”(good)。在其後給亨德父親的信件中，馬禮遜

報告了這個好結果，並說亨德在漢語這樣一門非常難學的語言上的進步“不僅是他個人的榮耀，也是英華書院的榮耀”。⁽¹⁾

馬禮遜對亨德的測試同時也是為了瞭解英華書院的教學水準，因為這所書院正是在他提議下創辦的(1818)，為此他捐助了一千英鎊用於校舍的建設。書院實行中外學生兼收的政策，既教中國人英文和西學，也為外國人學習漢語提供培訓。⁽²⁾馬禮遜建立這所學校的重要目標之一是為英國以及其它西方國家培養緊缺的漢語人材。

亨德來到英華書院時，書院的院長是倫敦會傳教士韓弗理(James Humphreys)，他是第二任院長，首任院長是協助馬禮遜創辦學院的倫敦會傳教士米憐(William Milne)，在擔任院長四年後於1822年去世。亨德在英華書院的漢語老師柯利(David Collie)是一位著名的漢學家，代表成果有《四書》英譯(1828)。亨德的另外一位老師是一個廣東人(Choo Seen-Sang，擔任柯利的助手)，他不僅熟悉中國經典，而且能說一口準確流利的官話。⁽³⁾有這樣中外高水準老師的指導，難怪在不長時間裡亨德的漢語學習就能夠取得良好的效果。

如果考察柯利最初的中文基礎，就會發現它是來自1823年馬禮遜訪問馬六甲時的指導，這樣一來，亨德就應該算是馬禮遜的“徒孫”了，雖然在英

*顧鈞，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副教授，文學博士。

華書院一年多的學習成果得到了“師祖”的肯定，但亨德並不就此滿足，他在廣州當地又找到了一位中國老師（Le Seen-Sang）繼續學習。但不久他所供職的公司破產，他於是不得不中斷學習返回美國。1829年他乘坐新僱主奧立芬（D. W. C. Olyphant）的商船“羅馬人號”（Roman）重返廣州。在船上他結識了最早來華的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 C. Bridgman），每天教授他中文。正是從馬禮遜的“徒孫”那裡，裨治文獲得了最初的漢語知識。英、美第一位傳教士之間的這層關係雖然有點巧合，但事實本身既說明了馬禮遜作為漢語教師的廣泛影響，也說明了美國漢語人材的缺乏。從1784年以來，美中之間的貿易不斷發展（至1792年貿易額僅次於英國），但半個世紀當中能夠熟練掌握漢語的美國商人卻祇有亨德一人。

商人追求的是商業利益，一般都來去匆匆，對於那些有機會長期居留的人來說，漢語的複雜難學也使他們或無心問津或裹足不前。美國商人不願意和不積極學習漢語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一種特殊的交流工具的存在。它不是漢語，也非標準的英語，還夾雜着一點葡萄牙語，就是所謂“廣州英語”（Canton English）。它起源於廣州人在與英國商人打交道的過程中無師自通學習英語的實踐（開始於1715年前後），其特點是完全不顧讀和寫的訓練，祇關注聽和說——把聽到的英文單詞用漢語記錄下聲音，再根據漢語注音說出來。這種看似簡單易學的方法帶來兩個問題，一是由於注音不準確（常常把英文單詞的多音節縮減為漢字的單音節）而導致發音走樣，二是由於缺乏系統的訓練而使說出來的句子完全不符合語法規則，毫無邏輯性可言。但這樣一個非常不理想的交流工具卻不妨礙做生意，甚至是大筆的生意。⁽⁴⁾

中美直接貿易開始後，美國政府於1786年向廣州派駐了首任領事山茂召（Samuel Shaw），1794年山茂召去世後他的職位由斯諾（Samuel Snow）接替，斯諾1804年底離職後由卡靈頓（Edward Carrington）接任（1806-1808），馬禮遜1807年從英國經紐約來廣州時帶着的正是美國國務卿給卡靈

頓的信件。卡靈頓離任後這一職位一直空缺直到1814年才由韋爾考克斯（B. C. Wilcocks）接任。但所有這些人都是商人出身。實際上，直到1854年，這一職位一直由商人充任。⁽⁵⁾但身份的轉變沒有為這些外交官帶來漢語學習態度的改變。1844年當顧盛（Caleb Cushing）代表美國政府前來和清政府談判時，他祇能請傳教士幫忙做翻譯。此後傳教士被借用的情況一直延續到1860年代，正如列衛廉（William B. Reed, 1857-1858美國駐華公使）在給美國政府的信中所說：

傳教士們在中國的工作和研究直接關係到了我們的在華利益。如果沒有他們擔任翻譯，我們的各項工作都無法進行；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助，我在這裡既不能讀，也不能寫，無法與中國人信函往來，更無法與中國人談判。總之，如果沒有他們，我根本無法開展工作。他們為我們解決了很多困難。1844年顧盛先生在中國的時候，為他做翻譯和幫助他的都是傳教士；1853年馬沙利（Humphrey Marshall）先生和1854年麥蓮（Robert M. McLane）先生在中國任職時，擔任他們翻譯的也都是傳教士。我們這次在中國工作期間，裨治文博士給予了我們莫大的幫助。現在他們仍然在盡他們所能為我們分憂解難。我要向他們表示真誠的謝意，感謝他們給了我那麼多幫助，為我們提出了那麼多寶貴的意見和建議。我還要感謝來自印第安那州的長老會傳教士丁韋良（William A. P. Martin）先生。他懂中國北方話，為我做口譯工作。⁽⁶⁾

英國的情況也並不更好，1816年阿美士德（William Amherst）勳爵率團訪問北京，翻譯工作主要由馬禮遜負責，到了鴉片戰爭談判期間，主要的翻譯一個是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John R. Morrison），一個則是德國傳教士郭實臘（Karl Gutzlaff）。

同樣是難學的漢語，為甚麼傳教士就能夠掌握呢？問題的關鍵在於動力與目標不同。傳教士來中國，志在改變中國人的信仰，這就要求他們瞭解中國人的心理，知道中國的歷史與文化，而這一切的

基礎便是掌握漢語。第二位來華的倫敦會傳教士米憐這樣表白自己的心跡：

我認為要學好這門語言是非常困難的（我至今都沒有任何理由改變這一看法），並且確信，對於一個才能平庸的人，需要長期努力，需要勤奮、專注和堅持不懈，因為掌握漢語知識後就能夠為基督教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因此，我下定決心，祇要上帝賜給我健康，我將竭盡全力，即使進步緩慢也不灰心沮喪。⁽⁷⁾

米憐的這段話也道出了其他來華傳教士的心聲。

1829年裨治文來華時，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給他的指示第一條就是要求他把開始的幾年投入到漢語學習中，並說如果發現廣州的學習環境不理想，可以考慮到馬六甲的英華書院。⁽⁸⁾裨治文後來沒有去英華書院，而是在廣州跟隨馬禮遜學習。1833年另一位美部會傳教士衛三畏（S. W. Williams）到達廣州後，也就順理成章地把裨治文當作了自己的漢語啟蒙老師。本來學習漢語最好是找中國人做老師，但當時清政府的極端文化保守主義政策（教外國人漢語有殺頭之禍）使這一點很難實現。即使能找到個別不怕冒險的老師，在師生雙方都精神緊張的情況下教學效果也一定不會太好。美部會的指示中擔心廣州的“學習環境不理想”，應該就是指此而言。這種不理想的狀況直到1844年才得以改變。中美《望廈條約》中約定：

准合眾國官民延請中國各方士民人等教習各方語音，並幫辦文墨事件，不論延請者係何等樣人，中國地方官民等均不得稍有阻撓、陷害等情；並准其採買中國各項書籍。⁽⁹⁾

裨治文是《望廈條約》談判時美方的主要翻譯，其時他已經來華十多年，但據中方人員的看法，他的口頭表達能力仍十分有限，“以致兩情難以互通，甚為吃力”⁽¹⁰⁾。1844年是馬禮遜去世十週年，這位最

早的漢語教師晚年境遇不佳，估計去世前幾年能夠用來指導裨治文的時間和精力都很有限，多年來裨治文主要是通過馬禮遜編寫的工具書來學習漢語，口語不佳也很難求全責備了。經過多年的學習，裨治文的漢語閱讀和寫作能力得到了長足的進步，1836年他用中文獨立撰寫了介紹美國歷史的《美理哥合省國志略》一書，就是明證。衛三畏在回顧條約簽訂前的中外交往時，特別強調了掌握漢語的重要性，他說：

無論是商人、旅行者、語言學者，還是傳教士，都應該學習漢語，如果他們的工作使他們必須來中國的話。說以下這句話是一點也不冒昧的：如果所有的人都掌握了漢語，就可以避免外國人和中國人之間的惡感，也同樣可以避免在廣州造成人員財產損失的那些不愉快的事件；中國人對於外國人的輕視，以及過去一個世紀以來雙方交流的倍受限制，主要原因是由於對漢語的無知。⁽¹¹⁾

中外之間交流不暢以至交惡，原因很多，但語言不通無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對於學習一門語言來說，教師固然重要，教材也同樣重要。19世紀早期的情況是，不僅漢語教師稀少，用於學習漢語的教材也很有限。如果不算萬濟國（François Varo）的《華語官話語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1703）、巴耶爾（Theophilus Bayer）的《漢文博覽》（*Museum Sinicum*, 1730）等18世紀的著作，就19世紀最初四十年的情況來看，主要的漢語學習工具書大致有這樣一些：小德金（Chretien Louis Joseph de Guignes）的《漢法拉丁字典》（*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çais et latin*）（1813）、馬士曼（Joshua Marshman）的《中國言法》（*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 1814）、馬禮遜的《通用漢言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15）、馬禮遜的《華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15-1822）、雷慕沙（Jean-Pierre Abel Rémusat）的《漢語文法綱要》、（*É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1822)、公神甫(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的《漢葡字典》(*Diccionario China-Portuguez*, 1833)。(12) 上述皆是歐洲人的著作，所以一個美國人如果不懂法文、葡萄牙文、拉丁文，就祇能使用寥寥幾部英文著作了。通過一種外語學習另外一種外語，其困難可以想像。對於美國人來說，雖然歐洲大陸語言對於他們並不陌生，通過現有的英文工具書來學習漢語無疑是方便法門。

鴉片戰爭後，美國來華傳教士的人數迅速增加，大大超過了英國，截止1847年，來華新教傳教士總共是一百十二人，其中英國三十五人，而美國是七十三人。(13) 面對越來越多的漢語學習者，1840年以後，美國人編寫的漢語工具書陸續出現。這些工具書對於使用者的價值大小各異，但對於編寫者而言，編寫過程無疑是一個最好的學習和深入理解與把握漢語的機會。在編寫漢語工具書方面，衛三畏是貢獻最為突出的一位。

1837-1839年衛三畏參與了由裨治文主持編寫的《廣東方言讀本》(*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但參與了多少已經無法確切知道，裨治文在前言中說，衛三畏負責的是其中“有關自然史的章節，以及其它一些細小的部分和整個的索引”(14)。根據衛三畏本人和他的傳記作者的說法，則是一半。(15) 此外該書的印刷工作也是由衛三畏完成的。《讀本》於1841年出版，是美國人編寫的第一部學習漢語的工具書，也是在中國寫作完成的第一本練習廣東方言的實用手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為了表彰裨治文的這一大貢獻，紐約大學在1841年7月14日授予他神學博士學位。(16)

裨治文之所以要編寫《讀本》，是因為想學廣東方言的外國人日漸增多，但自馬禮遜的《廣東省土話字彙》(*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1828年問世以來，“一直沒有其它有價值的工具書出版，對這一方言的忽視顯然難以適應日益增長的中外交流”(17)。正如書名所標誌的那樣，該書以簡易語句的形式提供練習，每頁分三列，分列英文、中文及羅馬字母拼音，並附註解。試舉兩例說明(註解從略)(18)：

Please sit down.	請坐	Tsing tso.
Very well!	呀好	A ho.
I now think of learning to read, with what book shall I begin?	而家想學讀書嘅乜野書起呢	I ka seung hok tuk shu hai mat ye shu hi ni?
With the tree volumes in the large character.	三簿大字書起咯	Sam po tai tsz shu hi lok.
Where are those volumes to be obtained?	邊處有個的書呢	Pin chu yau ko tik shu ni°H
At the bookseller's shop.	書鋪就有喇	Shu po tsau yau le.
I beg you will buy a copy of them for me.	請你同我買一套	Tsing ni tung ngo mai yat to.
I will do so.	做得	Tso tak.
A leaf is the first sprouting of the bud when yet tender.	蘗乃枝上初生至嫩之處	Un nai chi sheung cho shang chi num chi chu.
The calyx is that which supports the flower's petals.	萼托花瓣者也	Ngok tok fa fan che ya.
A catkin is the silken flowers of a willow.	柳絮柳之絲也	Lau sui lau chi sz ya.
Corol is a general term for the petals of a flower.	葩花瓣總稱也	Pa fa fan tsung ching ya.

上述第一段對話選自第一篇第二章〈習言〉，第二段引文則選自第十四篇第一章〈草木百體〉，應該是出自衛三畏之手。全書共分十七篇，分別是：1) 習唐話，2) 身體，3) 親誼，4) 人品，5) 日用，

6) 貿易，7) 工藝，8) 工匠務，9) 耕農，10) 六藝，11) 數學，12) 地理志，13) 石論，14) 草木，15) 生物，16) 醫學，17) 王制。可見作者的意圖不僅在幫助讀者學習廣東口語，也在幫助他們獲得

有關中國的各類資訊，將語言的學習和知識的學習結合起來。

馬禮遜的《廣東省土話字彙》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英漢字典，第二部分是漢英字典，第三部分是漢語片語和句子（Chinese words and phrases），漢英對照。《讀本》可以說是對第三部分的擴大和補充，與前書相比，篇目的設置更貼近日常生活，例句更為豐富和精當，註釋的加入也是特色之一。《讀本》的出現無疑為廣東方言的學習提供了有力的幫助。但是大八開本、六百九十三頁的部頭使這本工具書不僅價格過於昂貴，而且使用起來也不太方便。簡單實用的《拾級大成》（八開本、二百八十七頁）的適時出版滿足了時代和人們的需要。

《拾級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 1842）是衛三畏獨立編寫的第一部漢語工具書。他在“前言”中說：“本書是為剛剛開始學習漢語的人編寫的，讀者對象不僅包括已經在中國的外國人，也包括還在本國或正在來中國途中的外國人。”⁽¹⁹⁾全書的內容如下：1）部首，2）字根（primitives），3）漢語的讀寫方式介紹，4）閱讀練習，5）對話練習（與老師、買辦、侍者），6）閱讀文選，7）量詞，8）漢譯英練習，9）英譯漢練習，10）閱讀和翻譯練習。因為是出於幫助人們學習廣東話的目的，《讀本》偏重於說的練習，而我們從上文可以看到，《拾級大成》則更側重讀、譯的練習，顯然是為了和《讀本》互補。在閱讀練習中，作者的編排是先給出中文，然後是拼音，然後是逐字的英譯，最後是符合英語習慣的翻譯。如第四章中的練習：

其人身長七尺面黃睛赤形容古怪

Ki yan shan cheung tsat chik min wong tsing chik
ying yung ku kuai

This man's body length seven cubits face yellow
pupil reddish form appearance odd wild

This man was seven cubits tall, his face yellow, his
pupil reddish, and his whole appearance very
remarkable.⁽²⁰⁾

這一章中的練習都是單句，且全部來自《三國演義》，而到了第六章，雖然同樣也是閱讀練習，但給出的卻是成段的文字，分別選自《鹿州女學》、《見東園雜字》、《聊齋志異》，顯示了作者由易而難，逐級提昇的編寫宗旨。翻譯練習的安排也是如此，從字句的翻譯到成段的翻譯，從提供參考譯文到最後不再提供參考譯文，作者顯然希望通過這些練習能夠使學習者比較快地掌握漢語。如果像衛三畏所設想的那樣，一個學習者通過前面的操練最終能夠完成書末成段的中譯英練習（選自《聊齋》、《子不語》、《玉嬌梨》、《聖諭廣訓》、《勸世良言》），那麼他確實可以說已經“大成”了。

《中國叢報》上一篇評論該書的文章認為，關於量詞的第七章“是全書中最值得稱道的一章”，因為“這個問題此前沒有受到應有的關注”。⁽²¹⁾衛三畏認為這類詞和英文中的 piece、sail、member、gust、sheet 等詞相似，但比這些詞用得遠為廣泛，特別在口語中更是如此，應該熟練掌握。他在書中列出了二十八個重要的漢語量詞，並設計了對應的練習。它們分別是：個、隻、對、雙、把、張、枝、條、間、座、度、幅、陣、粒、場、群、筭、副、件、塊、糖、行、架、朵、片、席、團。確實，對於外國人來說，漢語的數量詞是難點之一，需要多加練習，衛三畏認為最好的方法是放在片語中進行學習。⁽²²⁾

《拾級大成》以練習為主，但不包括開頭三章。它們是作者關於漢語的論述，衛三畏要求讀者認真閱讀這三章，因為它們對於整個漢語都是適用的，並不像後面的練習那樣祇限於廣東話。其中第一章“部首”尤其是衛三畏着意的重點，他在這一章中按照筆劃順序詳細解說了二百一十四個部首每一個的發音、意思、在漢字中出現的位置，以及由其構成的漢字的特點。如關於第一百七十七個部首“革”作者是這樣寫的：

革，音 Kak。沒有毛的未硝的獸皮；拒絕，
解除工職。該部首置於左邊；大部分字與皮革、
皮革使用、皮革製品有關。⁽²³⁾

衛三畏這裡對部首的排列完全是根據《康熙字典》。部首的建立最初是許慎的重大創造。而二百一十四部首的確立卻是明人梅膺祚的功勞，在其所著的《字彙》一書（成於萬曆乙卯即1615年）中，他將《說文解字》五百四十部與《篇海》四百四十四部合併為二百一十四部首以後，還將部首“以字畫之多寡循序列之”，每部首中的字也是按照筆劃多少排列。所有這些都被後來的《康熙字典》完全繼承。⁽²⁴⁾《康熙字典》是中國近代影響最大的字書，也是傳教士最常利用的工具書。

衛三畏將部首的詳細介紹作為《拾級大成》的第一章，是有他特別的考慮的。他認為，作為學習漢字的起步最好的方法是從部首開始，就像學習字母文字必須從字母開始一樣。“部首廣泛地運用在漢字的構成上，可以幫助對於漢字的記憶”，而一旦漢字的形狀知道了，“它的意思和發音也就比較容易記住”，“雖然中國人不採用這種學習漢字的方式，他們似乎是把漢字作為一個整體來記憶，但對外國人來說這可能是最容易的方式。”⁽²⁵⁾這一看法顯然是非常有道理的。這也是為甚麼雖然中國已經有了那麼多現成的字典，而外國人還必須編寫漢語工具書的原因，因為學習母語與學習外語是不同的，需要不同的教材和學習方法。《拾級大成》出版後反響良好，《廣東紀錄》(Canton Register)和《廣東報》(Canton Press)的編輯在他們的報紙上撰文，向讀者推薦這部工具書。⁽²⁶⁾

在《拾級大成》出版兩年後，衛三畏又推出了另一部工具書《英華韻府歷階》(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1844)。這是一部英漢辭彙手冊，按照英語字母順序依次列出單詞和片語，並給出中文的解釋和官話註音。如：

Common 平常的 ping shang ti；粗糙 tsu tsau
Common custom 常規 chang kwei
Common use 通用 tung yung
Commonality 愚民 yu min；常人 chang jin
Commoner 凡夫 fan fu

Commonly 常時 chang shi

Common-Place 常談 chang tan ⁽²⁷⁾

之所以用官話註音，是為了適應中國內地已經逐漸開放的形勢。由於廣東、福建仍然是當時傳教士和其他外國人活動的主要區域，所以在書後的索引中，除了官話註音，衛三畏還給出了該辭彙表中出現的所有漢字（按照二百一十四部首排列）的廣州話和廈門話註音。《英華韻府歷階》可以看作是馬禮遜《廣東省土話字彙》第一部分——英漢字典——的擴大和補充。馬禮遜的辭彙手冊出版於1828年，早已絕版，鑒於這一情況衛三畏編寫了這本工具書。

通過學習別人編寫的字典和自己動手編寫工具書，衛三畏具備了紮實的漢語基本功，這為他以後編寫更大的工具書奠定了基礎。1874年衛三畏耗費十一年心血完成的漢英字典——《漢英韻府》——剛一問世，就立刻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和高度的評價。梅輝立(William F. Mayers, 時任英國駐華使館漢務參贊)、哥羅威爾德(W. P. Groeneveldt, 時任荷蘭駐華使館漢務參贊)、廷得爾(Edward C. Taintor, 時任海關稅務司)等均認為《漢英韻府》是繼馬禮遜《華英字典》之後最重要的漢語學習工具書，並在很多方面超過了後者，正如廷得爾指出的那樣，《漢英韻府》的真正價值在於“它的條分縷析、高品質的定義與釋義，以及我們認為是檢驗字典編寫者水準的言簡意賅”。他在評論文章中寫道：

幾乎誰都能用冗長的意譯傳達出一句中文短語的主旨，而編者卻僅用幾個英文單詞便做出了確切的翻譯，這是耐心、細緻的工作的結果——有時甚至付出了努力也做不到這一點。兩種語言、兩種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是如此不同，以致許多時候幾乎無法用同樣短小的英文句子來表述某個簡潔的中文短語，這一困難更被漢語中常用的精煉的諺語加劇，這些諺語暗指某一歷史事件或民間傳說，硬譯成英語常讓人費解。為了展示

這種諺語的用法，同時也為了說明新字典定義的恰切，我們選“騎虎之勢”為例，在馬禮遜的字典中該短語被如此定義：騎在虎背上的人的狀態，跳下來比呆在虎背上更危險；捲入壞事過深，退出便會覆滅（the state of a person who rides on a tiger, it is more dangerous to dismount than to remain on its back; to be so involved in a bad cause that retreat is certain ruin）。衛三畏博士的定義為：人騎在虎背上時沒有退路（as when one rides a tiger; there's no backing down）。馬禮遜博士用了三十五個英文單詞，而衛三畏博士祇用了十一個。每個人都必須承認，準確、到位、簡潔是後一種翻譯的特點。”⁽²⁸⁾

從1841年的《廣東方言讀本》到1874年的《漢英韻府》，美國人的漢語學習和研究走過了一條從無到有，從幼稚到成熟的道路。《漢英韻府》的出版為美國人早期的漢語學習劃上了一個完滿的句號。

【註】

- (1) William C.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Shanghai: Mercury Press, 1938), pp. 7-10; William C. Hunter, *Bits of Old China*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11), p. 161.
- (2) 關於英華書院，詳見米憐著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Malacca: The Anglo-Chinese Press, 1820)一書附錄七，以及 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一書。
- (3) William C. Hunter, *Bits of Old China*, pp. 237, 259.
- (4) 詳見 S. W. Williams, "Jargon Spoken at Canton",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pp. 429-433. 關於“廣州英語”和其他“中國式英語”的詳細研究，可參見 Kingsley Bolton, *Chinese Englishes: A Sociolinguistic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一書第三章“The archaeology of 'Chinese Englishes', 1637-1949”。
- (5) 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New York: Barnes & Noble, Inc., 1941), p. 63.
- (6) 轉引自 F. W. William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888), p. 274.

- (7) William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p. 103.
- (8) Eliza J. Gillett Bridgman, ed., *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s in China: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New York: Anson D. F. Randolph, 1864), p. 22.
- (9) 梁為楫、鄭則民主編《中國近代不平等條約選編與介紹》，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年版，頁36。
- (10) 文慶等纂《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臺灣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72卷，頁3-4。
- (11) 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New York: Wiley & Putnam, 1848), vol. 1, p. 500.
- (12) 馬禮遜對1824年前出版的西方漢語工具書按照年代順序進行了初步的整理，參閱 Robert Morrison, *The Chinese Miscellany* (London, 1825), pp. 44-51.
- (13) S. W.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vol. 2, p. 374.
- (14) E. C. Bridgman, "Introduction",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p. i; 另外一個參加者羅伯聃 (Robert Thom) 負責五、六兩章節，而馬儒翰則對大部分初稿進行了審閱和修訂。
- (15) F. W. William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p. 105.
- (16)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 68.
- (17) E. C. Bridgman, "Introduction",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p. i.
- (18) E. C. Bridgman,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pp. 7-8, 436.
- (19) S. W. Williams, "Preface", *Easy Lessons in Chinese*, p. i.
- (20) S. W. Williams, *Easy Lessons in Chinese*, p. 63.
- (21)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4, p. 346.
- (22) S. W. Williams, *Easy Lessons in Chinese*, pp. 123-148.
- (23) 原文是：“177 革 Kak. Untanned hide without the hair; to reject, to degrade from office. The radical is placed on the left; most of the characters refer to leather, its uses, and things made from it.” S. W. Williams, *Easy Lessons in Chinese*, p. 25.
- (24) 王力《中國語言學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頁105。
- (25) S. W. Williams, *Easy Lessons in Chinese*, p. i.
- (26)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1, p. 389.
- (27) S. W. Williams, *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p. 41.
- (28) William F. Mayers, "Dr. Williams' Syllabic Dictionary", *China Review*, vol. 3 (July 1874-June 1875), p. 139; W. P. Groeneveldt, "Dr. Williams' Dictionary", *China Review*, vol. 3 (July 1874-June 1875), p. 232; E. C. Taintor, "Review of Syllabic Dictionary", *North China Herald*, 15 October 1874.